

“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

——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

禹权恒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等人较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中,建构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类”形象。与传统文学史家不同,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经过“他者”的多角度阐释,鲁迅形象得以不断增值,从而呈现出多副面孔。鲁迅形象的多样化描述,反映了鲁迅本体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同时,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海外汉学的研究视角,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辨析其中的洞见和谬见,惟有如此,鲁迅研究才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他者”;鲁迅形象;海外汉学;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2-0108-07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革命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如果从1913年恽铁樵对其文言小说《怀旧》的评论开始算起,鲁迅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光辉历程。其中,不同时代读者对鲁迅的描述从来没有间断过,分别建构了各自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卡里斯玛典型”,鲁迅不断地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而逐渐被经典化。在中国大陆正统的文学史著中,鲁迅必然是书写的重中之重。鲁迅曾经被塑造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左翼文艺运动的旗手”、“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等形象。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鲜明地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这一结论被无限地放大和强化,鲁迅终于成了“新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建国之后,许多文学史家编纂中

国新文学史,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进行书写的。比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新文学史纲》、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都是严格遵循此种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晖说:“鲁迅形象是被中国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他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1]然而,鲁迅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任何对鲁迅形象的塑造,都和鲁迅本体之间可能存在着差距。如果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来看,鲁迅必然会呈现出多副面孔,这可能也是鲁迅研究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2013-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66)

作者简介:禹权恒(1980-),男,河南泌阳人,文学博士研究生。

一、“另类”鲁迅形象的 经典化塑造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与中国大陆较为正统的文学史家不同,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Wolfgang Kubin)等人置身于红色意识形态之外,或者说他们受到极左政治思潮的影响较小,这就为其重新认识鲁迅形象提供了绝佳条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建构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形象的“另类”鲁迅,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是,他们都对鲁迅做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然,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评价标准迥然不同,其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部分结论是和鲁迅相悖离的。然而,他们研究鲁迅的视角是极具借鉴意义的。他们对鲁迅形象的描述到底存在着哪些差异?各自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哪些观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警惕的?这些都是本文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夏志清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1961 年,其早期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删减版,旋即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评价热潮。全书分 3 编,共 19 章。夏志清把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分为 3 个时期:初期(1917 ~ 1927),成长的十年(1928 ~ 1937),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 ~ 1957)。其中,夏志清在论述鲁迅的时候,开篇就说:“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 1936 年逝世之后,他的声誉更越来越神话化了。”^[2]紧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对《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 Q 正传》做出了系列评价。其中,夏志清在论述《阿 Q 正传》时说:“《呐喊》集中最长的一篇小说当然是《阿 Q 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这些缺点,可能是创作环境的关系。”^[2]然后,夏志清解读了《彷徨》中的短篇小说《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此时,夏志清将其与鲁迅早期小说集《呐喊》的风格特点进行了对比,他说:

“《彷徨》收集了一九二四至二五年间写成的十五篇小说,就总体而言,这一个集子比《呐喊》更好,但是由于它主要的气氛是悲观沮丧的,所以并没有受到更热烈的好评。”^[2]比如,夏志清在分析《肥皂》时说:“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鲁迅敏锐的讽刺感。这种讽刺感,可见于四铭的言谈举止。而且,故事的讽刺性背后,有一个精妙的象征,女乞丐的肮脏破烂衣裳,和四铭想象中她洗干净了的赤裸身体,一方面代表四铭表面上赞扬的破旧的道学正统,另一方面则代表四铭受不住而做的贪淫的白日梦。”^[2]这种迥异于正统文学史家的“异见”,非常鲜明地折射出夏志清特殊的审美趣味。他还总结了鲁迅后期的文学创作情况。夏志清认为,本时期的鲁迅思想既不左也不右,变得完全孤立起来。在具体阐释鲁迅后期的杂文创作时,夏志清说:“作为讽刺民国成立二十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我们对鲁迅更基本的一个批评是: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且不说他晚年的杂文(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苏联阿谀的态度,破坏了他爱国的态度),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2]夏志清认为,这种“温情主义”在鲁迅较差的小说《孤独者》中具有深切表现。最后,夏志清对鲁迅做了一个总体性评价:“就长远的眼光看来,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能够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瑞斯、班强生到赫胥黎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予以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2]由此可见,夏志清在塑造鲁迅形象时,由于置身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文化语境中,遵循的是一种迥异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逻辑规范,这就使他可以根据个人的理解来任意言说,部分观点缺乏严肃的科学依据,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共 3 卷,上卷于

1975 年出版,中、下两卷分别于 1976 和 1978 年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司马长风的研究领域本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才逐步转到中国文学史。为了防止中国大陆新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千篇一律,避免出现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学尺度的弊端,他决心以纯文学立场来重新编纂中国新文学史。在该书中,司马长风介绍了“文学革命”(1915~1918)之后,把中国新文学史发展划分为 4 个时期:诞生期(1918~1920)、成长期(1921~1928)、收获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他认为新文学史之所以要如此划分时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就文学史的全程来说,适当的分期可显露发展的大势,流变的关键,从而了解全程的特点,把握其精神;第二,就个别的分期来说,可以突出该时期的特点,便于人们了解和研究。”^[3]其中,司马长风在第 5 章《新文学的诞生和胜利》中,详细地论述了鲁迅的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首先对其予以极大肯定:“用日记体写小说,在中国是首创;用白话写没有故事的小说更是首创;但凭写一个疯子的胡言乱道,浑然成一个完整的创作,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成就。对于一篇初试啼声的小说,我们只有无条件的喝彩。”^[3]但他随之又对鲁迅前期的小说创作给予微讽:“所谓受上述观点的限制,是说把小说(也可以说是文学)看成了改良社会的工具,在他看来,小说并不是为了表现艺术的美,而是利用小说形式,艺术装饰来传达改良社会的思想,来激动人们去改良社会。只要能达这个目的,他便不再多做艺术加工,因此艺术之肉每每包不住改良社会之骨,作品未免太寒素,有时太简陋了,又因为不太去写风月,使作品缺乏色彩和情调。读来如置身在阴暗天幕下的冰原上。”^[3]在第 8 章《鲁迅小说——一枝独秀》中,司马长风对鲁迅及其他作品做出了深入评价。首先,他总结了鲁迅前期小说《孔乙己》、《药》、《故乡》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之后,他对鲁迅代表作《阿 Q 正传》进行了再评价,一一指出其存在的严重缺陷:小说的部分用语缺乏大众化的特点、主人公没有统一的个性特征、主题和内容都是一个灰冷绝望的世界。此种看法明显区别于 20 世纪 50 年代较为正统的新文学史著对《阿 Q 正传》的评价。可以看出,司马长风绝不迷信中国大陆较为流行的所谓“正确”观点,独独痴迷于自己的个人主义看法。在第 11 章《短篇小说欣欣向荣(上)》中,作者对鲁迅的《肥皂》、《离婚》以及《在酒楼上》做出了高度评价。紧接着,司马长风对五四时期两位主要小说家鲁迅和

郁达夫进行了有意味的比较,话语中暗含着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他盛赞郁达夫小说在鲁迅之上:“《沉沦》辞藻的凄婉生动,情意的真挚纯粹,当时文坛确无人能及。即使鲁迅小说也不行。鲁迅的文字比郁达夫凝练、冷隽,但是从审美眼光来看,不过是一把晶光发亮的匕首;可是郁达夫的辞藻,尤其《沉沦》里的辞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彩并且多姿。”^[3]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此种评价堪称相当前卫和新锐,是和当时的主流观点不相符的。但是司马长风又说:“鲁迅的作品篇篇都经千锤百炼,绝少偷工减料的烂货,但是郁达夫则有一部分失格的作品,在谨严一点上,郁达夫不及鲁迅。但是郁达夫由于心和脑无蔽,所写的是一有情的真实世界,而鲁迅蔽于疗救病苦的信条,所写则多是没有布景,缺乏色彩的概念世界(只有《在酒楼上》《故乡》少数例外);在文学的浓度和纯度上,鲁迅不及郁达夫。”^[3]最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的第 18 章《三十年代文坛》中,介绍了左联成立前后鲁迅的主要思想和社会活动。面对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作家的群体性围攻,鲁迅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和执着。随后,鲁迅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第三种人”之间发生了激烈论争,直到 1936 年鲁迅逝世为止。可以看出,司马长风此时对鲁迅后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关注较少。比如,鲁迅后期的杂文、散文、小说创作等,都没有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更谈不上做一种比较客观的评价。

顾彬是当今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作家和翻译家,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和译作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鲁迅选集》(六卷本)。其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的文学史著。2008 年范劲等人把该书翻译成中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顾彬在其中文版序言中说:“我和我的同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 W 的问题:什么,为什么以及会怎样?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国分类的其他对象。”^[4]全书共分 3 章:第 1 章《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第 2 章《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第 3 章《1949 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关于以什么标准来遴选中国作家之时,顾彬说:“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

准。在这方面我的榜样始终是鲁迅,他在我眼中是 20 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除了他的重磅作品之外也有其他的零散之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这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4]顾彬在第 2 章《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中,以《救赎的文学:鲁迅和〈呐喊〉》为题,对鲁迅及其前期小说创作做出了具体评价。首先,顾彬从对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译名开始谈起。他认为,迄今为止的种种翻译没有一个触及到了要害,主要原因在于:“这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中国革命的反宗教特征和将鲁迅神圣化,为社会变革的旗手的做法给这部小说集里也许是最重要的文本的细致阅读制造了障碍。”^[4]之后,顾彬对鲁迅《呐喊·自序》做出了独到评价。他说:“读者能体验到,作者绝不是当时青年运动的代表和支持者,经过细致阅读,读者发现的毋宁说是这场运动的批评者。”“这个文本包含的不仅是那个时代历史和苦闷史的中心形象,而且同时还呈现出了极其多样性的主题的大杂烩——也可以说是一个万花筒。”^[4]可以看出,按照顾彬的独异思维方式,许多读者都曾对这篇序言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误读。顾彬主要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梳理了“旷野”意象在西方世界的意义变迁史。该意象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点可以说体现得非常鲜明。同时,他也道出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属于“救赎文学”的内在原因。顾彬据此得出结论:“旨在将中国从民族和社会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中国现代派的许诺,一旦被当作了宗教替代品,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让知识分子翘首期待一个超人、一个领袖,也就是一个弥赛亚式的被世俗化的圣者形象,从而无条件地献身到革命事业中去。在这个语境下也就能看出对鲁迅作品的误读。”^[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彬说:“对鲁迅作品的每一解读因此都必须从一位不可靠的作者、个别情况下甚至从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出发。作者与他那个时代以及他本人的距离,使他在 20 世纪的中国显得如此独异,只有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做到了对局限性的反思,能看透文人作用的渺小。”^[4]显然,顾彬在阐释“旷野”、“国民性”、“中国形象”等诸多关键词时,充分调动其博学多才的固有优势。正是这种知识结构使他看待问题的思路大开。此时,他为我们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另类”的鲁迅形象。他说:“他没有同时代人的幼稚。正是他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这些小说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范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其意义有三重性质:分别在于新的语

言、新的形式和新的世界观领域,这已被普遍地认可为突破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4]最后,顾彬对《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一件小事》、《阿 Q 正传》等作品进行了解读。值得一提的是,顾彬对鲁迅代表作《阿 Q 正传》做出了另类评价:“从某个方面说,《阿 Q 正传》脱离了《呐喊》从总体上看还保持着抒情性的框架。该作品缺少其他作品所表现的绝望、紧张和压抑,而这种特征于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中变得完全是有目共睹。”^[4]

二、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的再阐释

可以看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影响力极强却也饱受争议的著作。作者以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路向。本着“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价”的基本原则,夏志清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本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这 4 位新发现的现代作家,后来被誉为“文坛新四家”。刘绍铭在《夏志清传奇》中说:“夏教授时发愕愕之言,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异见分子,《小说史》对张爱玲另眼相看,已叫人侧目。但更令道统派文史家困扰的,是他评价鲁迅的文字中,一点也看不出对这一代宗师瞻之在前、仰之弥高的痕迹。”^[5]该书成书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时中国政局动荡多变,一切均以政治挂帅,但夏教授不随波逐流,敢于坚持立场,立一家之言。若非他具有恢宏独到的眼光和独排众议的魄力,相信该书也未必会以现时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发展也可能会改写。作为一个身处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夏志清曾接受过正规的欧美文学教育,特别是受到西方“新批评”文学思潮的影响较深,使他十分关注文本所彰显的自身价值。而且,夏志清对中国大陆当时极左的政治思潮尤为反感。在评价鲁迅之时,他以一个异见分子的立场,做出自己的独立评价。一方面,他承认鲁迅的抗议精神使后来者深受启发;另一方面,却对鲁迅的温情主义以及对粗暴和非理性主义的默认态度不满。此种见解严重动摇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霸主地位。换言之,夏志清极为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不遗余力地批判那些或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情的作者,认为他们失去了对文学的鉴别

力。在这一评价尺度下,许多左派作家自然首当其冲。因为对他们而言,文学与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互为利用。但是,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夏志清对鲁迅评价的部分立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原因在于完全脱离政治因素的所谓“纯文学”立场是根本不存在的。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曾深受极左政治的严重侵害,但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它明显地违背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这种倾向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当然,夏志清对鲁迅的迥异评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另类”的鲁迅形象,这完全是运用另一种视角来关照鲁迅,其重要意义是不容抹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说:“全书体制恢宏,见解独到,对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和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也因为这本书展现出的批评视野,使夏志清得以跻身当代欧美著名评家之列,而毫不逊色。更重要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史,也许碰触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灶炉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是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够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6]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较具个人特色的文学史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极左政治思潮的冲击,中国文学史研究几乎陷入一种停滞状态。当然,鲁迅研究也不能够逃脱此种厄运,可以说也是深受其害。为了摆脱极左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研究的干扰,司马长风花费了数年之功,终于写出一部特色鲜明的新文学史著。司马长风在遴选中国现代作家之时,完全遵循“艺术至上”的审美原则。他明确地阐明了衡量文学作品的具体标准:“一是看作品所含的情感的深度和厚度,二是作品意境的纯粹性和独创性,三是表达的技巧。”^[7]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置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于不顾的做法,明显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治学理路。不可否认,与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新文学史著相比,司马长风的纯文学史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他极力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拒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纠正了过去文学

史著中的诸多偏见和错误。但是,此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学史著,有时会在不自觉之间走向另外一种偏颇,从而丧失文学史应该具有的科学性。而且,由于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许多应该入史的作家都没有能够进入司马长风的研究视野,这就决定了该书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史著。其中,他在具体论述鲁迅的文学创作之时,对鲁迅后期的许多作品语焉不详。但是,他对自己比较推崇的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却大书特书,运用巨大篇幅来为沈从文大唱“赞歌”。不仅如此,他经常以沈从文作品的悠长来和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照,以此作为他们在文学史上是否重要的衡量标准,这明显属于一种比较主观随意的治史态度。比如,司马长风为了凸显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极力反对“文以载道”的主张,对鲁迅作品中“为人生而艺术”的倾向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长风说:“具体的说,分析不清,文学不宜载孔孟之道,也不宜载任何之道。换言之,我们反对文以载道,是从文学立场出发,认为文学自己是一客观价值,有一独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种神圣目的,而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束缚她,摧残她,迫她做仆婢做妾侍。因此,把文学监禁起来,命令她载孔孟之道固然不可,载马列之道也不可。无论载什么道,都是把她贬成了手段,都是囚禁文学,摧残文学,坚持下去必然造成文学的畸形发展,终至于气息奄奄。”^[3]总而言之,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对鲁迅形象的塑造既有真知灼见,也存在偏见甚至谬见,它们共同掺杂于文学史叙述之中,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做好辨析工作。

顾彬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德国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具有一种非常“痴迷的偏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动态,并且颇有建树。不可否认,他具有极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了解多国语言和文化传统,在论述中国作家之时不自觉地带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腔调。但是,这一比较阅读习惯也给他在评价作品之时带来了灵感。顾彬非常推崇鲁迅,以一种“疏离”的眼光来观照鲁迅,把鲁迅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标杆和榜样。可以说,他对鲁迅的尊崇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喜爱。顾彬十分重视鲁迅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认为鲁迅是一个世界性作家。比如,他十分关注鲁迅《呐喊·自序》中的“荒原”意象,也就是“旷野中的呐喊者”意象。他由此追溯了《圣经》、尼采

以及艾略特的作品,在对比过程中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独特性,即它所担负的与民族复兴相关联的极为艰难的启蒙使命,以及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包含的反讽意味。但是,顾彬肯定鲁迅和其他文学史家神化鲁迅是不一样的。他是从一个独特角度进入鲁迅作品世界,进而发现了鲁迅作品中孕育着典型的“忧郁”色彩。不仅如此,顾彬也极为赞赏鲁迅散文的语言魅力:“在恐怖暴政之下,鲁迅成功地在开口和沉默之间发展了中国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他所采用的方式至今无人能及。他偏爱重复句式、悖论和辛辣嘲讽。他调遣着不同的语言层次:白话文与口语,口语又同文言相交杂。高雅和平白的语言运用、中西文法、本国语与外来词构成了一种需要反复阅读的独特风格。”^[4]可以说,顾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异样”的鲁迅形象。此种形象不为我们所熟知,但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鲁迅文学世界的理解。在顾彬论述鲁迅作品的话语中间,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斟酌的地方,甚至部分立论基点是极为不牢靠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晓明说:“不过,顾彬很难把自己的态度理顺,因为他的立足点会摇摆移动,顾彬似乎也试图建构一个无所不能的鲁迅形象,鲁迅不只是身处于时代激流的前列,猛烈地批判国民性、批判封建的过去和专制的当代,但他并没有沉醉于新文化运动,而是他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8]但是,不管顾彬对鲁迅的论述存在着多少不足,也不能够掩盖他对本问题的深度思考,何况这种思考极具启发性。因此,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下了极大功夫的,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史著。因为他非常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不受固有结论的左右,坦诚直言,且时常有十分精彩的独立见解。顾彬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另类”的鲁迅形象,为深入研究鲁迅打开了一扇窗户。

三、结 语

总而言之,不管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抑或是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们在塑造鲁迅形象方面的贡献颇大。虽然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但在具体评价鲁迅及其作品之时,都做出了一种独立思考和判断,把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真实地表达出来。与大陆较为正统的文学史著相比,他们

没有把鲁迅“神圣化”或“妖魔化”,而是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出发,为鲁迅研究的长足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来讲,我们只有努力祛除鲁迅研究的政治之魅,才有可能呈现出鲁迅的真实面相。因此,竹内好说:“中国文学只有不把鲁迅偶像化,而是破除对鲁迅的偶像化、自己否定鲁迅的象征,那么就必然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出无限的、崭新的自我。”^[9]这绝对不能够成为我们对其漠视的主要理由,因为任何人对鲁迅的描述都不可能和鲁迅完全吻合,只是有的表现得真切一点,有的塑造得稍逊一些而已。通过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对鲁迅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一方面,我们必须摆脱过去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站在世界文学的新高度,重新审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努力营造一种较为宽松和谐的研究氛围,为深化鲁迅研究找准切入点;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海外汉学家对鲁迅形象的描述绝不是尽善尽美的,有的观点明显是一种随意性的主观判断,部分结论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面对海外汉学对鲁迅研究的“洞见”和“偏见”,我们绝对不要过分迷恋,也不要极力排斥,应该采取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正确地加以辨析。只有如此,鲁迅研究才有可能逐步走向深入,而不致于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 [1] 汪 晖. 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 [2]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刘绍铭,李欧梵,林耀福,等,译.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
- [4] 顾 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 范 劲,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 刘绍铭. 夏志清传奇[M]. 信报,2001-06-16(5).
- [6] 王德威. 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J]. 当代作家评论,2005,22(4):17-27.
- [7]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下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 [8] 陈晓明. 对中国的执迷:放逐与皈依——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J]. 文艺研究,2009,31(5):153-163.
- [9] 竹内好. 鲁迅[M]. 李心峰,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LU Xun image in eyes of “other”

—XIA Zhi-qing, SIMA Chang-feng and Wolfgang Kubin as
investigation subjects

YU Quan-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in XIA Zhi-qing's, SIMA Chang-feng's and Wolfgang Kubin's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history books, LU Xun “alternative”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constructed. Unlike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ians, they hav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value positions and aesthetic tastes. Illustrated from the “other” multi-angles, image of LU Xun has been added more values, thus it is presented with multiple fac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U Xun image description reflects that LU Xun himself contains abundant spiritual resources. Simultaneously, we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perspectives, showing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ttitude to discriminate insights and delusions. Only in this way, the study of LU Xun may gradually tend to be mature and improved.

Key words: Other; image of LU Xun; overseas Sinology; diversification

(上接第 107 页)

- [8] 冯友兰. 冯友兰学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9] 西南联大校友会. 笛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10]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48.
- [11] 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1937 至 1946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2] 瀚青, 王国新. 梅贻琦的学校管理思想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2, 20(3): 90-96.
- [13]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一[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 [14] 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 [15] 殷海光. 殷海光文集: 第四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16] 闻黎明, 侯菊坤. 闻一多年谱长编[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Analysis of the university spirit through reading the files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ZHANG Qian-wen¹, LI Xin-jun²

(1. Youth League Committe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Archiv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can be summarized as impoverished but more steadfast and firm, combined and united, concentrated on study, compatible and extensive, and independent and free. According to the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theory of Eric Ashby, the authors categorize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to the environment type and the heredity type, and analyze the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les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Key words: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cultural spirit; file;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